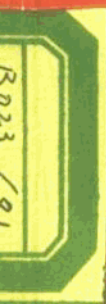


理智的困惑

陶远华

理智的困惑



船

PDG

……历史的结果就是：最复杂的真理、
一切真理的精华在于(人类)最终会了解自己。

——卡尔·马克思——

正如在生物和非生物之间做出区分那样，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古老的、深刻的区分……。研究这种区分及其在科学知识的逻辑和方法论方面的困难，恐怕是当代科学哲学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M.W.——瓦托夫斯基——

序

陶远华同志的新著《理智的困惑》一书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因为它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社会认识论专著，填补了我国认识论研究的一项空白。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一本有价值的哲学书，总是要这样或那样反映（准确地说是总结和概括）着其所处时代的优秀文化、科学成果和最新实践经验，因而能够对时代的发展起推动作用。我以为，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是一本对社会发展起有益作用的书。

真正的哲学，其主要功能，是为人们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使人们的头脑更聪明、人们的行动更加符合规律。

哲学应当关心人、关心人类的命运。科学的哲学，不论它研究什么，它的出发点、中心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而这社会主体中的主体，乃是劳动群众。在当代，抛开人的哲学研究，是空洞的研究；抛开人的哲学，对人类命运漠不关心的哲学，不是真正科学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不同的主要之点，在于它是实践的哲学：它不但要科学地说明世界，而且要积极、有效地改造世界。当然，改造世界并非人们的最终目的。实践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主张从人出发、依靠人、为了人而去改造世界。解放人、改造人、为了人，使人成为世界的真正主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追求的伟大理想。我感到，陶远华同志的书，

是努力体现这一思想的。

作为作者的指导教师，我为他取得的丰硕成果由衷地高兴，同时更热切地希望他能够在今后取得大的成就。希望属于青年，未来也属于青年。

崔自铎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一、理智的困惑：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难题	(1)
“社会测不准”问题(3) 坐标原点与利益的认识效应问题(3) 情感信息问题(4) 描述的模糊性与精确性问题(6) 社会科学实验问题(9) 证据问题(11) 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问题(13) 政治与认识问题(15) “移植问题”(17) 社会科学理论的合理性问题(20) 社会科学理论的功能问题(23)	
二、实践的选择：人必须反思自己的社会认识过程	(25)
“全球问题”：人类面临自己的挑战(26) 新技术革命：“第四要素难题”(28) 严峻的案例：不可避免的问题(30)	
三、历史的逻辑：认识论发展的具体化趋势	(31)
主体化趋势：从认识的结果转向认识主体(32) 过程化趋势：从主体认识状态的研究转向认识结果的获得过程的研究(34) 具体化趋势：从对认识论的一般研究转向具体认识领域的研究(36)	
四、艰难的进程：社会认识论研究的可能与困难、历史与现状	(39)
可能性的证明(39) 面临的困难(43) 社会认识论研究史略(44) 现状(46) 理论前提(48) 研究方法(48) 逻辑结构(48)	

第一章 社会客体论	(50)
一、客体的感性形式	(50)
客体成立的认识论前提: 感性形式(50) 社会是什么(53) 关于社会感性形式的历史争论(56)	
二、社会客体的感性形式	(61)
“实践活动”: 社会客体的感性形式(61) 形式I: 实践活动自身的感性结构(63) 形式II: 实践活动的感性结果(75) 形式III: 实践活动的感性中介——符号(86)	
三、作为感性形式总和的社会现象及其认识论特征	(94)
社会现象与社会事实(94) 社会现象的意识参与特征(101) 社会现象的价值特征(107) 社会现象变化的高频率特征(110) 社会现象的非再生特征 (113)	
第二章 社会认识主体论	(115)
一、关于社会认识主体的动态研究	(115)
社会认识主体与社会互动过程(115) 社会认识主体发展的逻辑与历史(118)	
二、关于社会认识主体的静态研究	(125)
社会认识主体的自我意识特征(125) 社会认识主体的意识形态特征(130) 社会认识主体的非理性特征(136)	
三、关于社会认识主体的形态研究	(142)
社会主体(142) 群体主体(或称“共同体”)(145) 个体主体(150)	
第三章 社会认识过程论	(158)
一、社会认识过程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	(159)
主客体关系的三种类型: 独立型、依赖型、融合型(159) 社会认识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基本类型(161) 类型I: “切近效应”与“庐山效应”(164) 问题的深化: 中介客体的意义(169) 类型II: 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175)	

二、社会感性认识.....	(181)
社会感性认识概念的提出(182) 社会感性认识的特征	
(188) 获取社会客体感性认识的特殊感知方式(192)	
感知方式I:“问”“答”(192) 感知方式II:感受(199)	
感知方式III:体验(202) 感知方式IV:内省(206)	
三、社会理性认识.....	(210)
关于社会的理性认识和关于自然的理性认识(211) 定	
性研究方法(212) 定量研究方法(214)	
结束语	(217)
主要参考文献.....	(219)

绪 论

一、理智的困惑：社会科学 研究中的认识论难题

每一个人类认识之谜的探索者无不下列事实所困惑：当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庆祝标志其走向成熟的经典物理学大厦落成之际，社会科学领域却仍在黑暗中痛苦摸索，即便是今天，人类的智慧之光虽然已涉足到其它遥远的星系，但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却仍然十分肤浅，甚至把自己所置身的社会当作神秘的“黑箱”。严酷的事实迫使人们思考：人类认识社会的进程为何如此艰难？本书不敢企图对这一素有“社会斯芬克斯”之称的重大难题提供答案，只是以社会科学研究为对象，探索这个领域中所碰到的种种具有哲学意义的认识论难题以及人们在这方面所作出的种种尝试。作者窃望，这一工作能够激起社会研究者的探索热情，并以此促进哲学认识论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从而结束哲学认识论长期偏重自然科学、冷落社会科学的不正常状况。

和自然科学的悠久历史相比，人们把对社会的认识当作科学的事业只是近代的事情。随着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社会科学也开始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认识领域。近300年来，社会科学虽然已有长足的进展，但仍然步履蹒跚、

困难重重。约翰·齐曼在他的《科学的社会范畴》一书中写道：整个社会科学“还处于相当初期和极其混乱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具有说服力的统一的原理可导出站得住脚的推论。”^① 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J.D. 贝尔纳对社会科学的这种落后现状作了令人心酸的概括，他认为，社会科学目前尚处于“描写性、会诊性和学术性状态。”^②

社会科学为什么长期处于这种落后状态呢？许多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等诸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譬如《历史上的科学》一书的作者从政治学的角度作了独到的分析。他指出：“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社会本身是内在的另一个因素，比上述任何一个因素更为有力地阻碍着真正大公无私的社会科学的形成。”^③ “社会科学的落后主要不是由于研究对象具有一些内在的差别或仅仅是复杂性，而是由于统治集团的强大的社会压力在阻止着对社会基本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④ 但是，所有这些探索仅仅是对社会科学的外在环境的研究，是对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研究。问题的深层原因还在于社会科学本身的内在矛盾，即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论矛盾。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社会科学不仅有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有利于认识论深化，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认识论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而忽略认识论的另一个深刻的源泉——社会科学。

实际上，社会科学愈是朝纵深发展，就愈是向哲学提出许多尖锐的认识论难题。

① 约翰·齐曼：《科学的社会范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页。

② 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58页。

③④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53页。

“社会测不准”问题^①

测不准定理，在观测源和观测对象处于同个能量级别，相互之间存在着能量和信息交换时，这一定理均可成立。在社会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考察社会现象时总是以现实的人的面目出现，人对人的观察，要通过相互接触，但接触本身就会使被观察对象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使研究者无法了解对象在未被接触时的状态，观察显然是在决定被观测对象行为的诸要素中加入了一个无法替代，同时也无法排斥的因素。另一方面，如果观测者和观测对象不发生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不干扰对象的存在状态，不熟悉对象生存的环境和文化规则，他又不可能获得关于对象的任何真实的感性材料。于是，发生在微观认识领域的测不准现象，在社会认识领域以其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形式出现了，一系列认识论问题摆在每一个社会研究者面前：研究者所获得的关于社会的感性材料是可靠的吗？人如何才能尽可能真实地反映他人的生活信息？

坐标原点与利益的认识效应问题

人类在观察把握各种事物时，首先要确定它的各种量度，建立起一个坐标参照系，由于人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观察世界的，所以这个参照系的坐标原点就是人类本身，人们总是以自己的利益、好恶和自然特性来观察和衡量世界，世界的一切都将在人类生存的意义上被评判，并在量度上同人类做比较。因此，就对待人以外的自然界而言，人类的观测角度和

^① 参见陶永谊：《人类重新寻找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1期，第90页。

方法基本是一致的，所以自然科学有它们统一的前提和法则。^①但是，当人类一旦把目光转到自己的问题时，原来观察自然现象的坐标参照系就失去了意义，坐标原点同时成了被观测的动点，衡量的尺度同时又成了被衡量对象。于是统一的人类认识整体被分割为不同的利益主体，以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中心观测世界所得出的结论，当然会五花八门，有时甚至大相径庭，并且，当所得结论具有自反意义时，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悖论。在这里，利益的认识论效应问题发生了。在社会认识领域中，研究者只有站在一定的利益立场，熟悉和体验一定利益集团的内在和外在环境，才能深刻地认识该利益主体（包括研究者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企图保持中立的社会研究者都不可能真正认识社会，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偏见是社会认识的动力。然而，正因为每个研究者都是一定利益的承担者和代言人，又使他不可能真正全面地认识社会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利益又成了社会认识中的阻力和多元性的根源。因此，每个社会研究者都被既定的社会现实置入一种认识论的两难境地和一个自我循环的“哲学怪圈”之中，人类万能的理智在自己的面前发生了困惑：为了阻止人们为自己的利益去编造谎言，人能够站在超越人类的立场来审视社会吗？社会的研究者们何以走出这个“哲学怪圈”呢？或者，难道他们非得走出这个怪圈不可吗？

情感信息问题

情感是需要的主体与对他有意义的客体的关系在他头

^① 参见《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11期，第89页。

脑中的反映，是一个人对客体所抱态度的一种内心体验。^①和大自然相比，人的情感世界是一个丰富无比，而又奇妙无穷的领域。人们所获得的关于社会对象的信息无不烙上人的情感的烙印。所谓情感信息，一方面是指对客体情感本身的反映，一方面是指社会信息被烙上的情感印记（包括作为主体的情感和作为客体的情感）。前者直接就是情感信息，后者严格说来可称为信息的情感方面。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科学地处理情感信息和信息的情感方面，对于社会研究者把握社会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实际的认识操作过程中这又是极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根本就不可能。

一般说来，情感信息具有下列特征：第一，情感信息的综合特征。情感的形成是各种社会因素和心理、生理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其表现形式来看，它是社会的表层显性因素，而就其内涵而言，它又是社会的深层隐性因素。第二，情感信息的夸张特征。情感是社会生活的一张极富色彩的漫画，是人的内心世界的曲折而生动的表现，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往往是夸张的。第三，情感信息的非稳定性特征。就社会生活的全过程而言，人的情感是富于变化的，它是社会本质的一种心理折射，在不同的情况下，情感可能具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表现特征。正因为上述原因：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自己的研究中审慎地处理情感信息，以准确而深刻地把握社会过程的本质。

然而，感情信息的获得和处理却又十分困难。首先，情感信息是很难作定量分析的，充其量，人们只能定性地描绘它的强弱程度。譬如，“对象正义和美感这样绝对的无时间性

① 彼得罗夫斯基：《普通心理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5—396页。

的概念，科学方法永无用武之地。”^①因此，长期以来，社会的情感方面往往只是文学、音乐、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不是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康德甚至断言：“心理学永远不能成为一门科学。”^②第二，处理情感信息的人本身是具有情感的人，因此，情感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同化和相斥往往干扰信息处理的客观性，那些与处理者的情感相投的信息可能会被放大，反之，则有可能被缩小，甚至被忽略。第三，缺乏处理情感信息的精密的物质中介。在自然科学中，人们可以用精密的科学仪器来分析和处理被研究对象的信息，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则主要靠研究者的亲自体验。电子计算机虽然能够模拟人脑的某些功能、代替人脑的某些思维活动，而且在某些能力方面，如运算速度、储存信息量等等，确实大大超过人脑，就其掌握的各种数据的精确度而言，也是人望尘莫及的，因此计算机愈来愈广泛地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但是，在处理情感信息时，却碰到困难。“例如，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过程，有一个思想感情的沟通问题，这当然是任何机器所不能代替的。”^③

描述的模糊性与精确性问题

社会科学诞生至今并没有获得很高的声誉，甚至许多人并不承认社会科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科学没有精确的定量描述。从17世纪开始，人们开始把数学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但是情景并不使人乐观。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曾经指出：

①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52页。

② 转引自鲁枢元：《文艺学的学科形态》，载《上海文学》1985年第9期。

③ 沈冲：《试论领导者的认识能力》，载《理论月刊》1986年第4期，第9页。

“数学公式的运用，一直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伴随在一起，现在也成了社会科学的风尚。这就像是一些落后的国家采用西方的非民族化的服装和议会制度，因为他们模糊地觉得，这些魔术般的衣着和仪式会使他们立即跻身于现代文化和现代工艺之列。”维纳在这里挖苦的是社会经济学。在他看来，收集可靠的物理数据是困难的，而收集一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数据更困难。“对于一些基本上是模糊的量，如果给以任何意味着准确的数值的内容，那是既无用处，也是不老实的，而任何想把精确的公式应用于这些不准确定义的量的企图，都只是胡闹和浪费时间。”^① 维纳的描述虽然有些过于悲观，但不可否认社会科学在精确化的进程中确实碰到种种困难。譬如统计学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运用，曾一度使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充满信心，但问题的真正困难不在于是否能获得关于社会的统计数据，而在于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数据，在于是否能够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得到正确的理论结论。用统计方法和计算所观察到的各种个别特征的发生频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我们能否对人或社会的本质作出有意义的概括？这就是所谓“统计推论的困难”。的确，有时社会统计数据给人以深刻的启发，但在许多情况下统计证据却给人一种“虚假的公正”。正如约翰·齐曼所说：“我们对特定社会事件所作的统计描述，本身并不客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偏见、地方习惯和所用程序。没有一种统计分析能将浩繁的资料恢复其本来面目，并从中构画出它们理应表示的社会现实。”^② 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没有一个荒谬透顶的论点找

① 转引自《上海文学》，1985，年第9期。

② 约翰·齐曼：《科学的社会范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页。

不到证明自己正确无误的“雄辩确凿”的统计数据。这一辛辣的讽刺迫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认识论的难题：怎样才能使人们对社会的认识精确化？用数据和公式来揭示社会本质的真正的逻辑的认识论机制是什么？

当人们用精确化和形式化来苛求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另外一些机智的研究者从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一工作的奠基性人物就是L. A·查德 (L. A. Zadeh)。他提出了模糊性概念。在他看来：“当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长时，我们对于系统特征的精确而有意义的描述的能力将相应降低，直到达到这样一个阈值，一旦超过它，精确性和有意义性就变成两个相互排斥的特性。”^① 精确和模糊是一切物质都具有的特征。当我们把这一认识推广到社会现象时，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社会历史现象是属于另一种和自然界不同的、模糊特点更具普遍性质的物质运动系统。社会现象的本质主要反映于模糊性。因此社会科学所表达的社会规律往往具有模糊性特点。^② 在社会科学中，“唯一真正定量的学科是经济学。经济学把一切社会关系都单一地用金钱来加以衡量，其衡量的精确度企图达到物理的精确度。”^③ 但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所说，经济学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首先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都是比较模糊的集。如价值、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既没有严格的外延，又无法找到一个最小单位量值，因而不能精确测量。其次，纯经济学虽然大量使用数学模型，尽可能地利用计算

① 陈贻源：《模糊数学》，华中工学院出版社，第13页。

② 这一思想参见《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11期，第53页。

③ 约翰·齐曼：《科学的社会范畴》，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页。

说明经济过程，但由于价格、货币单位这类基本计量单位及其代表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估测成份，并且每时每刻都处在不稳定中，因而它们对客观对象的说明就没有在自然科学中那样有严格的意义。^①如上所述，模糊性理论及其模糊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显然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希望，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更为深刻的认识论问题：模糊认识的机制是什么？从模糊到精确是否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具有模糊性特征的社会科学理论如何指导具有严格意义的经济运行过程？

社会科学实验问题

实验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祥地，它标志着人们从对自然的消极、直观的态度转向积极地探索它的奥秘，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动性。“在自然科学中，通常可能采用精密的研究技术，通过这种技术研究对象往往被带到实验室里去，在实验室里，研究对象可以处在严格的已知环境条件中，在有限的范围内，这种环境条件可以用已知的方法加以改变，并且，问题的回答可以持续地受到检验。”^②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想通过严格的实验去获得可靠的证据却并非易事。这是因为：第一，社会科学实验本质上是一种非受控实验。和自然相比，社会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处于高级形态的系统。研究主体不可能完全了解对象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更不能随意地根据实验意图去改变这些环境条件，因此

^① 参见付小随：《社会规律的模糊性特点与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一文，载《社科评论》1985年第11期。

^② Vernon Pratt,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London, 1981, Chapter 12.

很难准确测定被实验对象在各种条件下的表现性状，而只能在基本上是既定的条件下，根据对象有限的变化得出结论。正如普拉特在他的《社会科学哲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实验的不可控性使我们很难获得支持理论的精确而严格的证据，这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现实的不可避免的难题。第二，和自然科学实验相比，社会科学实验的实验周期很长，有些实验观察甚至需要几年、几十年，乃至几代人的长期工作。社会科学的实验室本质上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时空是同一的，因此研究者不可能在一个纯粹的空间中采用人工的手段缩短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一特点就使得社会研究者不可能及时地得出可靠的结论，用以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从而使人们认为社会科学的结论大都是马后炮，正如贝尔纳所说，社会科学研究表面上成了一种对常识的总结，把一些单纯的事物弄得复杂化，相反把学生引入迷宫。事实上，“这些事物即使没有任何科学，学生自己也会想到的。”^①第三，社会科学实验很难具有超前性。自然科学实验往往走在实践的前面，这种超前性是科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无论是研究的主体还是客体都不可能超越自己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总体上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不可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新村的样板去感化和召唤资本家放弃自己的财产。欧文为了证实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力图通过实验在阶级对抗的社会范围内建成若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小岛，以便在实例的影响下改变社会，他不惜重金在美国创办了“新协和”公社，但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很快淹没了欧文的“新协和”孤岛。第四，社会科学实验不能严格重复。任何一

①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60页。